



学问深沉转邃密 著书淑世兼益人

——读王宇信先生新著《中国甲骨学》有感

朱彦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一. 作者王宇信先生简介

王宇信,男,1940年出生于北京市平谷县和平街。1956年初中毕业于北京平谷中学,195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良乡中学。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研习甲骨文字。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是当今甲骨学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

王宇信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甲骨学与殷商史,主要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甲骨学导论》、《西周史话》等等,参加《甲骨文合集》(13卷本)的编辑工作,后来担任《甲骨文合集释文》组组长,协助胡厚宣先生做总编辑工作,并担任《甲骨文合集释文》总审校,参与著述《甲骨文字诂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之《先秦卷》)、《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商周甲骨文》、《殷商史》(十卷本)等,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甲骨学精粹选读》、《甲骨文精粹释译》等甲骨学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之多。

二. 《中国甲骨学》的版本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王先生新作《中国甲骨学》,翻检其中的目录和一些章节,似乎并不陌生。原来这是王先生在其三部学术名著《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和《甲骨学通论》的基础之上,又做了新的补充和修改的增订本。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这部《中国甲骨学》,是从《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开始,经过我对《甲骨学通论》的学习和总结、思考,并追踪不断涌现的

中国甲骨学研究发展的大量新材料、新成果,由此带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一部通论性著述。”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是王先生当年跟随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做研究生时,按照胡先生的要求所做的读书笔记,积累而成的一部著作。而《甲骨学通论》,实际上是当年王先生给我们安阳师院殷商文化研究班学院讲课的家底。1985年前后,王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同时,也到安阳市文化局给甲骨文爱好者和甲骨文书法家们搞了几次甲骨学讲座。这些讲座效果极好,反响热烈。由此,在出土甲骨文的古城安阳掀起了一股学习甲骨文的热潮。

王先生就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之上,修改整理,写成了这部深受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欢迎的《甲骨学通论》。该书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安阳召开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发。

到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时,王先生根据十年间的甲骨文新发现和甲骨学研究新进展,对《甲骨学通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出了一个增订本。至2004年,韩国首尔东文选出版社出了一个由李宰硕教授翻译的韩文本《甲骨学通论》。

由1999年到2009年,又是一个十年。其间又有许多的甲骨文材料新发现,有许多甲骨学研究的新成果出版发表。包括王先生自己,也对甲骨学及其以甲骨卜辞为材料而进行的殷商文化研究和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于是,就有了这部更新的甲骨学综合论著——《中国甲骨学》的出版。

所以在这个新著出版之际,王先生将其前两本书的由胡厚宣先生、李学勤先生分别写的四篇序言,都置于卷首,除了有王先生对两位先生的感谢和敬佩之外,也还是道出了这部新著与前两部学术著作之间的版本关系。

新版本的出版,增加了新的甲骨文资料,包括

1991年的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窖藏坑、1996 年北京琉璃河西周甲骨文、2002 年殷墟小屯南地甲骨文、同年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甲骨文、2003 年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晚期甲骨文、2003 年以来的陕西周原周公庙西周甲骨文、2008 年洛阳新出土西周甲骨文等，并对这些新的甲骨文资料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王先生如今已经年过古稀，但仍在学术的山道上辛勤地跋涉着，在学术的迷宫里持续地探索着，所以总是不断地有学术新成果问世。王先生这种对自己学术成果的长期打磨和完善，体现了一个学人对学问研究的执著，对读者朋友的负责，和对学术事业的高度的责任感。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年轻学人学习和敬佩的地方。

三.《中国甲骨学》在内容方面的创新性

从篇章结构来看，《中国甲骨学》分绪论和上、中、下篇，上篇是殷墟甲骨学史和殷墟甲骨学研究专题，中篇是西周甲骨学，下篇是比原来的《甲骨学通论》多出来的部分，在原书基础上增补的近些年王先生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历史及对出土甲骨文的殷墟遗址的系列论文，其中包括《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谈上甲至汤灭夏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商代的马和养马业》、《甲骨文“马”、“射”的再考察——兼驳马、射与战车像配置》、《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简论殷墟发掘第一阶段在我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等，可以说这是王先生利用甲骨文材料对殷商文化和殷墟考古所做的长期探索、不断思考的学术结晶。

即便是上篇和下篇，是原书中本来有的结构部分，也做了许多的补充和延展。有的是在原来的章中增加了一些新节，比如：

第一章《绪论》中，增加了第二节《中国的“旧学”自甲骨文出土而另辟一新纪元》，权威地论证了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使得传统的金石学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途径和空间；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而且也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并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章《甲骨文发现和甲骨学研究的几个阶段》中，增加了第四节《再谈殷墟 YH127 甲骨窖藏发现在甲骨学史上的意义及新时期面临的课题》，对于集中出土甲骨文的 YH127 坑甲骨窖藏作了专

题研究，尤其是充分肯定了该坑甲骨在甲骨文分期断代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 YH127 坑丰富了甲骨学研究的内容，诸如刻划甲骨卜兆的现象、发现毛笔书写的字迹、涂朱涂墨甲骨的发现、改制背甲的使用、甲桥刻辞的大量发现、武丁大龟的发现、成套甲骨的出土、殷人甲骨分埋的启示等等，这些众多的甲骨学现象，分别促使从甲骨文分期断代和殷商史研究等方面，把甲骨学研究的“发展时期”（1928~1949）推向了高峰，为甲骨学研究向“深入发展时期”的前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指出 YH127 坑自发现以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而新的甲骨材料著录后，学者们都蜂拥而去，对 YH127 坑甲骨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将是新时期的甲骨学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第十二章《重要甲骨的著录及现藏》中，增加了第六节《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著作：〈甲骨文合集〉》，承前面第五节《集大成的著录——〈甲骨文合集〉及其编纂》，对作者亲身参加其中的《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的体例和方法，以及其中的种种艰辛磨难，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让人感到这些珍贵的甲骨材料著录之来之不易；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了《甲骨文合集》是集八十多年来出土甲骨文资料之大成；同时也是新时期甲骨学发展的里程碑，由于《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带动了后来的《甲骨文合集补编》、《甲骨文合集来源表》、《甲骨文合集释文》的编纂和出版，从而推动了一系列的古文字研究专著和古文字工具书及甲骨学殷商史著作以及综合性甲骨学论著的面世，全面推动了甲骨学研究朝着深入发展的阶段迈进。

第十三章《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要籍》中，增加了第五节《近年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甲骨学著作》，对邻邦日本学人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做了撮要的总结和介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尤其是介绍了松丸道雄和高嶋谦一合著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介绍了此书的编纂体例及种种便利读者之处，介绍了他的创新价值及在考释甲骨文字方面的慧眼识见，认为是一部集近百年来甲骨文字考释之大成的巨作。介绍了伊藤道治、高嶋谦一合著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上下卷英文版），综述了该著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以甲骨文材料为主考察了商代的宗教祭祀的发展流变、历史及社会与国家的政治结构，形成了由第一期对上神上帝的祭祀，演变成第五期祖先神系统的祭祀，以及由王室祭祀系统的不同，发现了殷王室构成的复杂性与殷商王室

实行传子制等的观点,主要内容之二,就是对甲骨文字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包括“句法与语义学”、“词法与语源”、“连词研究的问题”等,分别对甲骨文的语言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认为该著将商代宗教祭祀和语言学研究引向了更为深入的阶段,是一部反映殷商文化的重要著作。另外,该部分还介绍了荒木日吕子的《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甲骨文》和成家彻郎的《甲骨文研究日本人著作目录》,认为前者是对传世甲骨文材料的“再发掘”,而后者则是全面而系统介绍日本学人研究甲骨文的主要论著的综合性工具书,为甲骨学界利用和了解日本学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果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在第二十二章中,《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是原来《甲骨学通论》中已有的章节,但在此书中,又增加了《“序”甲骨文书法集谈甲骨文书法》一节。王先生以甲骨学专家及甲骨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的身份,充分地认识到了要做到甲骨文知识的社会普及,甲骨文书法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方便法门,因此如何引导甲骨文书法家正确地书写甲骨文字,就成了甲骨学家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分支。王先生不仅自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适用的甲骨文书法创作理论,而且对从事甲骨文书法艺术创作的朋友也多有引领和鼓励。这里所收的王先生为几位甲骨文书法家的作品集序言,正是王先生对此问题多年思考的一个集束。

其中有的则是整章的添加补充,如第五章《论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甲骨学研究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包括第一节《一九七八年以后,甲骨学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根本改观》、第二节《一九七八年以后,甲骨学研究课题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第三节《一九七八年以后,甲骨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愈益与当代科技同步发展》、第四节《一九七八年以后涌现出的大量论作,显示出甲骨学研究进入“全面深入发展”的阶段》、第五节《商周甲骨文的不断发现,为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第六节《我们的建议》等,这一章的增设,是对以往中国甲骨学史几个阶段划分的补充,即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甲骨文发现和研究,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证,指出了新时代甲骨学研究的诸多便利和迅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甲骨学研究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使甲骨学研究走上了新的康庄大道。在此其中,尤其是于甲骨学研究课题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一节,对于甲骨学研究尖端课题的甲

骨文分期断代在新时期的发展,有了一个明晰而简要的勾勒,包括揭露“文武丁卜辞之谜”(将所谓“文武丁卜辞”定在武丁时期)、武乙文丁卜辞细分、“历组卜辞”大讨论(传统四期卜辞能否前提至武丁时期)、甲骨文分期断代新方案探索(“新派旧派”说与“两系”说)、甲骨文有无帝辛时代卜辞和哪些卜辞属于盘庚时代等等。虽然在后面的第九、十两章有对甲骨文分期断代专题的论述,但于此章简略地勾勒一下甲骨文分期断代在新时期的发展,对于完整的甲骨学史来说,也是完全必要的。所以,作者在“我们的建议”中称,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后五十年,自1978年为分界,此前为“深入发展”时期,此后则进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而所谓“全面深入发展”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就是1978年甲骨文集大成著录书《甲骨文合集》的问世,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再如第六章《甲骨文、甲骨学与甲骨学的科学界定》,也是新书的新创制,其中包括第一节《甲骨文与甲骨学的学名由来》、第二节《“甲骨学”的科学界定》等,则是对甲骨学名称的缘起以及甲骨学学科的权威界定,使得甲骨学这样一门年轻而古老的学科有了科学的支撑。在《甲骨学通论》一书中,我们知道了“甲骨文”一词的来历和其他曾用名之间的关系。而从这本书里我们知道,甲骨文和甲骨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有“龟”、“龟甲”、“契文”、“书契”、“贞卜文”、“卜骨”、“卜辞”、“卜文”、“龟版文”、“龟甲兽骨文字”等多种不同的称呼,直到1921年陆懋德发表了《甲骨文字发现及学术价值》以后,“甲骨文”才在学术界流通起来。而“甲骨学”出现更晚,是在“甲骨文”一词开始使用的十年之后,1931年周予同发表《关于甲骨学》一文,才使得“甲骨学”之名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有将“甲骨文”与“甲骨学”等同起来的现象,其中包括对甲骨学体系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甲骨学大家如董作宾先生的一些论著也是如此,屡屡将甲骨学混同于“甲骨文字之学”。也是到了1978年之后的甲骨学全面深入研究时期,甲骨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言得到了科学的界定。张秉权先生在其《甲骨文与甲骨学》一书中称:“甲骨学所研究的是甲骨文,但并不限于甲骨文字,凡是和不用甲骨以及卜辞所涉及的一些有关的事项,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列。”王宇信先生《甲骨学通论》中还说:“应该明确的是,甲骨文并不是甲骨

学。甲骨文只是商朝后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的文物和史料,它的科学价值,只有随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才愈益为人们所认识。而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是甲骨文自身固有规律系统的和科学的反映。……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甲骨文与甲骨学混为一谈。”而通过该书的“甲骨学”的科学界定,我们知道了“甲骨学”所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字甲骨,而且包括无字甲骨,包括占卜甲骨的钻造形态,包括甲骨出土的考古学地层、坑位,包括甲骨出土的伴出物及遗址关系,包括甲骨文字考释、甲骨文例研究、甲骨文分期断代、甲骨文殷商史研究等等,对甲骨文进行全方面、多角度的研究,是对甲骨学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十四章《甲骨学研究与学者之间的友谊》也是整章补充进去的,包括第一节《于老(省吾)“致祝”(商承祚)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第二节《商承祚教授对〈甲骨文合集〉编纂工作的巨大贡献》等。主要是讲了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对于省吾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及《甲骨文合集》等甲骨学史上重要著作编纂的巨大贡献,其间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娓娓道来,令人读之兴味盎然,并对商先生之于学术事业的无私奉献深表敬佩。只是可惜的是,可能是限于篇幅的原因,这一章节没有展开。实际上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很多,值得放进去的学者及学者之间的种种佳话不乏其例。比如孟广慧对王懿荣(同是甲骨文发现者)的崇敬与造访、刘铁云与孙诒让等早期甲骨学者的苦心孤诣、罗振玉和王国维的亦师亦友亦亲家的密切关系、郭沫若和董作宾之间的前密后疏的恩怨纠葛、罗振玉对商承祚及容庚等人的提携、王国维对唐兰及陈邦怀等人的鼓励、王襄与叶玉森在学术上的鱼雁往还、陈梦家与闻一多的文史师承、张政烺对李学勤及裘锡圭等人的学术影响、胡厚宣对王宇信与杨升南等人的造就培养等等,均是这一类的极其有用且有趣味的学术史资料,如果将来能够再版(我想肯定能够)的话,建议将这些内容展开来写,庶几可以使中国甲骨学史变得更加丰富、厚重而且感人。

再如第十六章《前辈大师点石成金,泽及后学》,包括第一节《明义士殷商文化研究的成功及对我们的启示》、第二节《甲骨学史上的一代宗师——郭沫若》、第三节《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与胡厚宣的贡献》等。这一章内容可以说是对第十五章《甲骨学史上有贡献的学者及其研究特点》的补充

和深入开掘,对甲骨学史上一些重要学者如明义士、郭沫若、胡厚宣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以及他们的为学理念等等,都作了理性的分析和随笔化的白描,准确而细腻,生动而感人,这同样让我们感到这样的甲骨学术史的真实和厚重。

同样,下篇中的第十九章《周原甲骨探论》、第二十章《读邢台新出西周甲骨刻辞》等,也都是整章补充进去的,是在其学术著作《西周甲骨探论》的基础之上,补充了新的西周甲骨发现材料,展现了作者对于西周甲骨学研究的进一步整体思考以及对新发现西周甲骨文的解读和探索。

对读两书,就会发现《中国甲骨学》在一些重要甲骨学问题,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补充和扩写。比如对于1991年在殷墟发现花园庄东地甲骨坑所引发的甲骨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就在许多章节中曾有涉及,多有着墨,不仅详细记载了花东甲骨的发现及整理、著录的过程,较高地评价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一部集拓本、摹本和照片为一体的全新甲骨著录模式,也是利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分类整理的甲骨学研究新成果,而且还对花东甲骨的研究争论诸如“王卜辞”与“非王卜辞”、占卜者“子”的身份、甲骨钻凿形态、甲骨时代分期、甲骨文例等等,都做了全面、准确、完整而权威的综述和评价,并对今后的研究前景提出了自己颇具启发意义的导向性意见。

凡此种种,在该书中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限于篇幅,兹不一一,相信读者诸君自会探奥其中,多有所获的。

四.《中国甲骨学》的学术贡献和写作特色

以往的甲骨学著作,也有专门写甲骨学史的著作,如董作宾、胡厚宣等前辈的《甲骨学五十年》、《甲骨学六十年》、《甲骨学年表》等,也有专写甲骨学知识的论著,如张秉权、严一萍等学人的《甲骨学》等。但都各有侧重,各有局限。

王宇信先生的《中国甲骨学》,可以说是这样一部著作,集甲骨学史和甲骨学常识为一体,融甲骨学分期研究与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为一炉,既有宏观的百年甲骨学史回顾的鸟瞰,又有微观的对甲骨学某些具体问题的烛照(比如对于甲骨文例的总结和对一些常用甲骨学术语的勘定等),既是一座初学者入门的宝筏津梁,又是汇集各家观点的综述(然而又不乏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既有丰富而权威的资料性,使初学者的浏览之便;又颇具研究

的学术性,使研究者能够追踪到甲骨学各个前沿问题的最新学术动态。

由于作者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年轻时王宇信先生曾经梦想当个作家),所以这样一部本来属于绝学难懂的专门性学术著作,让一般人读来也并不费劲——至少我的研究生每个人都能读来津津有味,甘之如饴。这与当前一些学术著作作“高头讲章”式、令人读之生厌甚至恐惧的现象决然不同。王宇信先生肯于又有能力将这些高深的学术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又能辞彩飞扬,生动有趣,一方面说明了他确实是号称“绝学”的甲骨学真正弄明白了,所以能够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作为新一代的甲骨学研究领军人物,确实有将甲骨学知识普及社会、让传统国学知识惠泽大众的淑世悲怀。为此,作为较早读到这本大作的读者之一,我特别要向王宇信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王宇信先生的该书之所以好读,令人爱读,除了上面所讲的王先生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辞藻华丽,工于铺陈,善于摹状之外,还在于他愿意或敢于在这样一部严谨、高深的学术著作里,加进一些与甲骨学或甲骨学史相关的生动事例,夹叙夹议,有史有论,给读者一些相关知识的同时,也带领读者漫游其间,令人如身临其境一般。比如,在讲到当年殷墟发现 YH127 甲骨坑时,说到了汉奸汪精卫也附庸风雅,到殷墟一游,结果不懂装懂,闹出了“这么大一个龟呀”的大笑话。再比如,说到著名的大版甲骨“菁华”、被收入《甲骨文合集》6057 号正反面的一版,在介绍了其最早被罗振常在小屯收买、被罗振玉收藏的文字之后,又写了作者自己和谢济先生 1976 年 4 月 5 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摹拓此版时与历博史树青、石志廉、傅大贞诸先生交往等情景,时值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作者办完历博的公事后,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参与其中,种种感慨,三十多年历历在目。凡此,都可以作为非常生动的学术史来读,令人寻味无穷。

可以说,一册在手,甲骨学大要尽在其中,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这当然是此书深受学界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 余 论

王宇信先生曾经接受媒体的采访,自称是甲骨学研究的“摆渡人”,言称自己是个过渡人物,上比

不了罗、王、郭、董“甲骨四堂”的国学功底,下比不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条件。这自然是王先生的对待长辈的谦虚之言,但这又是王先生发自肺腑的挚诚之言。我们在《中国甲骨学》这部大作里,就见到了王先生这种谦逊和挚诚之处。

王先生现在已经是殷商文化学会的会长(我们私下也有戏称其为“商汤”、“武丁”或“殷纣王”的)了,但对前辈学者则表现出了出奇的尊敬。在本书的出版时,王先生将乃师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学术大家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为其前两部著作所做的序言四篇,置诸篇首。按照王先生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我对二位先生当年对我学习中国甲骨学的鼓励、期望和支持的由衷感谢”,另一方面,“在三十年、二十年前胡厚宣师和李学勤先生为我所写序言中提出的一些课题(实际是给整个甲骨学界提出的)和十分深邃的意见,有的今天已经有人完成,有的尚在进行中,有的在加深认识和再讨论中,有的至今还没人进行……因此,这几篇对中国甲骨学发展有前瞻性意见的序言,历久弥新,至今仍对中国甲骨学研究富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对于如今的一般学者而言,能够做到对师长的尊敬是不太难的事情,而能够做到对晚辈学者的尊重却并不那么容易。君不见,现在学术界有一个不成文字的所谓“潜规则”,即著述作文引用大学者和著名学者的论点,而对于年轻学者或无名之辈的成果,则往往视而不见,如果引用了这些后辈晚生的论著,好像会降低自己的学术水平一样。王宇信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甲骨学家,一个长期主持和组织甲骨学研究和交流的学术领导,对后辈学者多有鼓励奖掖和提携扶持,这是非常难得的学术品格。作为王先生的早期学生,我个人对王先生在日常工作中对我的诸多照顾以及学术上的鼓励支持,感同身受,受益匪浅。同样在这本书里,王先生以一个真正学者的大度和包容,对年轻学人的学术论著和学术成就,也多有介绍与表扬。比如对我的同学刘学顺博士在 YH127 坑甲骨的研究成绩、对于发现周公庙西周甲骨的年轻考古学家雷兴山博士的努力作为,王先生在书中不吝笔墨,多有赞词。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见王宇信先生的人品与学品了,可以体察其作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会长的胸怀了。

以上是我读《中国甲骨学》一书的感想,谨此奉闻,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匡其不逮。

(责任编辑:周广明)